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重视人才的『虹吸现象』

□ 孙 锐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要重视人才的“虹吸现象”，“这种‘虹吸现象’，实际上就是我们只要政策搞得好，会有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回到国内来报效祖国，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虹吸现象本义指一种流体力学现象，在日常语境中常用于描述资源流动并集中起来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用“虹吸现象”比喻汇聚人才资源的有效路径，强调完善的人才政策在吸引、集聚、留住人才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但是，人才资源在局域、区域及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均衡配置的，表现为优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具有显著区域竞争优势的地方流入，因此，要想构筑人才竞争优势，必须健全完善人才政策，全方位引进用好人才。

人才“虹吸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区域，基于特定政策等一项或几项长板优势，形成竞争优势，带来对周边区域或领域人才群体的强劲吸引力，能够推动域外人才群体向该区域进行持续性、动态化流入。近年来，留学人才归国潮的持续升温，印证了这种“虹吸现象”的显著成效。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海外留学生回国超过400万人，其中2021年回国创新创业的留学人员首次超过100万人，凸显出国内发展环境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这些带着国际视野的“海归派”，正在成为我国新经济领域的重要力量。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度显著增强。各地出现“抢人大战”，尤其是多个中心城市加入其中，竞相争夺高层次人才、高科技人才和优秀青年大学生，这也体现出各地对人才资源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普遍共识。但需注意的是，“虹吸现象”往往也具有“双刃剑”属性，正向效应体现为人才集聚带来的创新能级的跃升和产业生态的升级，负面风险则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导致欠发达地区陷入人才流出困境。当前，我们推动人才政策虹吸，要强调在效率与公平间寻求平衡，通过构建有组织、系统化、协同性的人才发展路径，形成人才配置最优解。

首先，精准把握区域发展定位，构建差异化人才工作体系。例如，雄安新区聚焦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未来之城”，推出顶尖人才、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吸引16条；海南围绕全域自贸港建设，大力引育经贸、商务人才，推进海外专业服务和技能人才便利化出入境。这些特色化政策设计，有助于形成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人才配置格局。其次，重视“最后一公里”落地问题，构建区域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北京中关村助力头部企业、高校院所、科技金融、多层次人才合作平台和创投服务建设，构建人才“引进—培育—服务”全链条生态体系；粤港澳大湾区试点跨境执业资格互认，打通专业服务流动壁垒。这些创新实践表明，只有构建完善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才能更好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扎根。最后，突破传统工作思维，建立开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南京推行“人才举荐制”，让行业专家自主认定急需人才；杭州试点的“成果终身追认制”，赋予科研人员更自由的探索空间。通过尊重创新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开展制度设计，正在释放人才持久的创新创造活力。站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人才“虹吸现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当创新要素在制度的沃土中自由流动，我们迎来的不仅是人才数量的飞速增长，更将是创新能级的质的飞跃，这种汇聚人才的“虹吸现象”也终将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重温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 李佑新

重读经典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就必须改造学习方法，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仍具有启示意义。

以改造学风建设大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全国性大党，担负着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责任。但是，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和迅速变化的形势，对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未作彻底清算，党内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在这一时期，我们党还发展了大量新党员，一些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党的历史经验的认识也有限，很容易受到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要建设好大党，就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领导中国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口号，要求全党自上而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并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随后，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场全党性的学习运动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开展起来。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倾向。一些人对于书本上的知识相当熟悉，而对于其他的东西一概不知，也不懂得结合新的形势灵活运用书本上的知识；一些人满足于夸夸其谈，不愿做实际工作，不愿做调查研究；更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危害极大。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厉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并强调：“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以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将主观主义态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对立起来，严厉批评了主观主义，提出要倡导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和态度。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的学风和态度，表现为不研究现状，“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表现为不研究历史，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都不懂或懂得很少，“言必称希腊”；表现为不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与主观主义的态度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作为一切行动的向导；强调研究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创造性地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考据学命题的“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在党史上，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作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强调，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因此，必须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对现实实际情况的各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以来的历史进行专门的和综合的深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文献。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具体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倡导和实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与思想方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要具体地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毛泽东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指出，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思想作风，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做实际工作的，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种作风和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为了改变这种作风，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他还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加强作风建设，就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干好本职工作、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八路军“是一支结构合理、军纪严明的队伍”

——读威尔伯·J.彼得金《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

□ 王鹏程

威尔伯·J.彼得金，美国军人，1943年到中国桂林担任步兵教员，1944年被任命为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主任参谋，并于1945年成为该团的指挥官。他是在延安时间最长、考察过敌占区、对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情况最了解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之一。其著作《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从多个视角深入介绍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经历，向世界客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形象。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被热情款待”

美军观察组延安之行并非国民党所愿，曾多次受到他们的阻碍，后又耽搁了出发时间。但是延安的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迫切希望通过他们的报告让美国方面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从而推动合作抗战。彼得金等人一到延安机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亲自迎接，这种友好态度一直贯穿观察组工作和生活的始终。在延安考察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精心准备饭菜，多次组织舞会，给予他们“最好的招待”。在去阜平的路上，120师师部的军官为迎接彼得金一行跑了80多里路，部队领导和当地居民也热情接待他们，为他们组织《都是一家人》《赶走敌人》等戏剧演出。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部队领导把他们安排在新窑洞居住，为他们量体制作军服，组织欢迎会。

彼得金在书中写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被热情款待。”这也让他感受到，考察组在延安和根据地受到的“热烈欢迎”与他们在重庆“总被监视”形成了鲜明对比。

“八路军的士气和精神面貌很让人振奋”

了解共产党军事武装力量、军事行动情况，分析其日后对战争胜利的潜在贡献力是观察组的重要任务。彼得金初到延安，就听到了彭德怀、聂荣臻的报告，与朱德、陈毅等将领进行了会谈，还专门参加了“红军的领导艺术和纪律”等讲座，参观了359旅建设南泥湾的情况。彼得金写道：“这与我在桂林步兵训练中心看到的展示部队大相径庭。”在深入游击区1300多英里的途中，他通过参观抗大、战地医院、药厂、兵器库、地道，与根据地将领、各军分区指挥员交谈，亲眼见证八路军的军事行动等，进一步感受到八路军虽然条件艰苦，但结构合理、战术得当、斗志高昂。他发现，八路军“部队和个人的道德观念很强”，他们日夜抵抗日军，这与“国民党军队中的道德观很差，所以日军能无阻碍地肆意推进也不足为奇”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

彼得金在书中附录了观察组成员惠特赛的报告《巴利奥历险记》，转述了八路军游击队为营救美军飞行员巴利奥所作的巨大努力。巴利奥一路看到八路军军纪严明，“积极投入抗战之中”，称“八路军的士气和精神面貌很让人振奋”。惠特赛也在报告中提到，“巴利奥的经历也证明，八路军能够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确是一支结构合理、军纪严明的队伍”。

“民众全心全意支持部队”

彼得金在考察中发现，“农民们非常支持中共的部队”。到延安之初，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对观察组讲述了“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在深入根据地过程中，彼得金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切实“减轻农民的税收”、实行民主政权等，感受到了根据地融洽的军民关系。《巴利奥历险记》更是详细记录了广大农民拥护八路军的各种行动，如在营救巴利奥的过程中，“每隔几分钟就有农民来报日军的行踪位置”，“不管白天黑夜，时时刻刻都有农民进进出出，来给游击队队长汇报日军情况”。在晋察冀根据地，巴利奥深刻体会到了根据地军民的血肉联系，他发现“那里的老百姓和村民与军队紧密结合，他们外出侦察、带路、运输、打仗，还把自家的房屋贡献出来，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帮助八路军”。他还感叹道：“当地老百姓宁可死，也不会说出八路军的秘密。”

彼得金在发给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的电报中，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时，称“民众全心全意支持部队”，这与巴利奥在国统区看到的国民党军队到处搜寻新兵，“用武力征兵，用绳子反捆住新兵的胳膊”，“征兵者向试图逃跑的新兵开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求回报、不求奖赏”

为了打倒法西斯这个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彼得金首先是带着培训任务来到中国的，但他对国民党军官在军事培训中“缺乏学习动力”感到十分失望，表示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巨大的贪污受贿现象感到震惊”，认为“整个国民党需要大整顿”。彼得金在国民党统治区鲜有朋友，但在延安和根据地却处处有至交，因为那里到处是他希望见到的积极抗敌、英勇御敌的人们。

彼得金与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军队将帅乃至延安的群众都是好朋友。他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都表达了“关切和不舍”之情。彼得金从延安到达重庆后，听说毛泽东等人将从延安飞往重庆谈判，他“竭力安排接待中共领导的到来”，无奈遭到了制止。彼得金把延安军民当朋友，延安军民也把彼得金当朋友，而且把一切支持中国抗日、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所有国际人士都当成朋友。彼得金在书中以日记、报告等不同形式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为营救帮助巴利奥所付出的艰辛，他们“不求回报、不求奖赏，甚至不求任何形式的补偿”。且他们为营救被俘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果断对日军展开攻击，“在激战中，游击队伤亡20人”。中国共产党人为自己的朋友敢于拼命，面对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敢于斗争，众多国际友人也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友好行为和斗争精神所感动，他们同样为中国抗日奋不顾身。彼得金在前往根据地的路上，就曾碰到从游击区返回延安的卡斯伯格、福尔曼、爱泼斯坦、沃陶和弗雷等人，称“他们早已与中国共产党同甘共苦了”。

彼得金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深厚友谊是在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中深入考察延安及根据地的结果。1978年5月，彼得金和原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受邀重返中国，受到了他的老朋友王炳南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的热情接待。在交流中，彼得金发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他之前在延安的时候要好得多，还感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

从外国人著作看中国